

国际科技本土突破对企业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

巩 冰 杨斯尧 徐照宜 尹文杰

摘要：本文在收集中国约 4 202.99 万件专利信息的基础之上，对不同国际专利分类在中国首次实现本土研发突破的情况进行了量化测度，并研究了企业的国际科技本土突破数量对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际科技本土突破能够促进企业人均薪酬与人均税金显著增加，但对企业人均慈善捐赠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竞争优势效应和税收遵从效应分别是国际科技本土突破促进企业人均薪酬与人均税金显著上升的重要渠道；声誉储备效应表明，对于已经拥有较多国际科技本土突破的企业，慈善捐赠并不能为其带来额外的声誉提升；国际科技本土突破也不能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随着企业科技本土研发突破数量的增加，高管的薪酬增长速度比员工的薪酬增长速度更快；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之后，本文的结果依然显著。本文研究为实现共同富裕之路提供了科技自立自强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引。

关键词：国际科技本土突破；共同富裕；收入差距；三次分配；税收遵从

[中图分类号] F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70 (2025) 10-0057-16

DOI:10.13510/j.cnki.jit.2025.10.004

引 言

收入分配作为经济学中永恒的话题之一，对经济健康发展、居民幸福感提升以及社会和谐稳定均有着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显著改善（孙豪和曹肖烨，2022）^[1]，国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不断扩大。2013—2020 年，我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 70% 以上，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但是，在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之时，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 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 0.466，高于 0.4 的国际警戒线水平。无论从纵向的居民收入差距

[收稿日期] 2025-01-21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项目“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政府金融协同赋能新创企业创新路径与机制”（2025QQJH89）

[作者信息] 巩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讲师；杨斯尧：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徐照宜（通讯作者）：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电子信箱 xuzhaoyi1995@outlook.com；尹文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硕士研究生

扩大角度，还是从横向的国际对比视角来看，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都较大，这揭示了中国在收入分配公平性上仍存在着较大不足（李实和朱梦冰，2018）^[2]。

本文在收集中国约 4202.99 万件专利信息的基础之上，创新性地将国际专利分类（IPC）作为不同科技的划分依据，将各 IPC 在中国首次申请并获得授权的日期视为我国实现了相关科技本土研发突破的时间节点，整理并计算了各上市公司以及各地区各年度的国际科技本土突破数量，并结合社会主义收入三次分配理论的分析框架，实证检验了国际科技本土突破对企业收入分配的影响。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很少有研究对企业或地区科技创新的影响进行研究或探讨（He and Tian，2020）^[3]。本文创新性地将研究聚焦于科技创新对企业收入分配的影响，采用新 IPC 在国内首次申请并获得授权作为国际科技本土突破的代理变量。基于这一创新性测度方法，本文实证检验了国际科技水平提升对三次收入分配的影响，对完善我国三次收入分配制度，强化技术突破的收入效应，改善企业内部不同参与主体的分配效应，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第二，目前以企业共同富裕为主题的实证研究，多以劳动收入份额作为代理变量，分析和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肖土盛等，2022^[4]；方明月等，2022^[5]）、工业机器人（王永钦和董雯，2020^[6]；何小钢等，2023^[7]）等对企业收入在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之间分配的影响，并不能完全覆盖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本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三次分配制度出发，创新性地采用人均工资、人均税金、人均慈善捐赠作为三次分配的代理指标，对科技本土研发突破促进企业“做大蛋糕”的收入效应进行了直接检验，同时又从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高管与员工薪资上涨速度差异性的角度，对科技本土研发突破能否“分好蛋糕”的分配效应进行了深入探讨。

第三，本文提出了竞争优势效应、税收遵从效应和声誉储备效应，并结合国际科技本土突破的竞争追赶特性、政府补贴的税收合规激励以及官方媒体和股吧投资者的海量文本情绪数据，对科技本土研发突破促进企业提高人均薪酬与人均税金的机制分析提供了实证证据，为剖析当前国际科技本土突破对企业慈善捐赠动力不足的原因提供了具体的现实解释，为进一步理解科技本土研发突破促进企业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机制提供了全面的经验证据。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我国科技体系的不断丰富与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国民收入水平获得了显著提升，中国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三次分配的概念，最初由厉以宁提出，他在 1994 年出版的《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一书中明确指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包括三次分配。第一次是由市场按照效率进行分配；第二次是由政府按照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通过税收、扶贫及社会保障统筹等方式来进行第二次分配；第三次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个人收入转移和个人自愿缴纳和捐献等非强制方式再一次进行分配”。其中，初次

分配是根本，再分配是关键，三次分配是补充。三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正确处理三者的关系，做到优势互补、协调联动、整体发力，是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制度性保障（李海舰和杜爽，2021）^[8]。

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和收入分配体系的具体执行者，在三次分配中均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首先，在初次分配阶段，企业通过组织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进行价值创造，并依据市场规律将经济产出以工资（劳动报酬）、股息（资本回报）、租金（土地收益）等形式分配给各要素所有者，这一分配过程实现了生产要素的价值归属。Schumpeter（1942）^[9] 在其经典的创新理论中，明确指出了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而企业是创新过程的关键参与者。根据熊彼特创新理论，企业通过突破性技术创新形成的“先发优势”，能够构建技术壁垒并获取超额垄断利润。这种竞争优势具有时效性特征，随着技术扩散加速（Lieberman and Montgomery, 1988）^[10]，后发企业通过技术模仿与路径优化可能实现快速追赶，这使得先发企业必须将垄断利润持续投入研发活动以维持技术领先地位。在此过程中，企业面临双重挑战，既要加大研发设备等物质资本投入，更需通过竞争性薪酬体系吸引和保留创新人才。Cadsby 等（2007）^[11] 的研究表明，与创新绩效挂钩的薪酬契约能有效激发员工的创造性产出，而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福利通过满足知识型员工的成就动机，可显著提升其工作投入度与组织承诺（Deci et al., 1999）^[12]。企业通过技术壁垒获取的超额利润为其优化核心人才薪酬体系提供经济基础，而高素质人力资本存量通过知识溢出效应转化为突破性创新的持续供给，进而强化企业在技术周期中的领先地位。基于此，国际科技本土突破作为技术优势的集中体现，其数量增长将重构企业的价值分配逻辑——技术壁垒形成的市场利润不仅补偿前期研发投入，更通过薪酬体系改革实现知识型劳动的价值重估，从而优化劳动要素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在初次分配阶段，国际科技本土突破数量的上升可以显著增加企业营业收入，提升企业市场利润，促使企业为维持创新能力和市场优势提高人均工资水平。

其次，在再分配阶段，政府通过税收、社会保险、转移支付等方式对初次分配的结果进行调整。在这个阶段，企业作为税收的主要来源，政府依赖企业的经营活动以收取税款，这包括但不限于营业税、所得税、增值税等。企业的经营状况、盈利水平以及税收筹措的效率和公平性，直接影响到政府再分配的能力和效果。然而，基于企业现实的证据则显示，避税是一个在全球企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世界银行对全球 102 个国家（地区）企业的调查显示，对于 1 元钱的收入，企业会平均隐藏 0.213 元用于避税（刘行和吕长江，2018）^[13]。因而，企业的经营策略和税务规划对于确定政府在再分配阶段的财政收入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税收遵从理论认为，当纳税人是完全的理性决策人时，税收遵从或不遵从的一切依据是使其个人期望效用的最大化（Allingham and Sandmo, 1972）^[14]。在我国，若企业逃税被查，有很大概率将面临 1 倍以上的罚款。因此，从完全理性决策的角度出发，当企业通过科技本土研发突破实现总收入水平显著提升时，应该增加缴税水平，规避逃税的违法风险，才能使企业实现效用最大化。

另外,我国政府对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历来十分重视,企业在创造出更多科技本土研发突破成果的背景下,有望获得税收优惠、研发补贴、人才奖励等一系列政策支持。这些政策不仅有助于增强企业的融资能力,也可以为企业的生存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更有利于企业开拓外部市场,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形成企业经营发展的良性循环。在此过程中,政府补贴作为重要的政策工具,在推动科技创新的同时,也影响着企业的税收遵从行为和长期发展战略。由于科技本土研发突破能够提升企业的产业竞争力,减少对外部技术的依赖,并契合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目标,政府往往通过财政激励政策加以扶持,以降低企业研发成本,增强其创新动力。同时,政府补贴的获取往往伴随更严格的财务透明度和税收合规要求,促使企业在享受政策红利的同时,主动提升税收遵从度,降低因避税导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非税成本理论认为,虽然避税可以帮助企业短期内节约现金流,但其引发的信息不对称会显著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刘行和叶康涛,2013)^[15],增加企业的第一类代理成本(叶康涛和刘行,2014)^[16]和银行借贷成本(Hasan et al, 2014)^[17],并提升企业的股价崩盘概率(Kim et al., 2011)^[18],损害公司的企业价值(刘行和吕长江,2018)。特别是对于依赖政府支持的科技企业而言,逃避税收可能影响政府对其的长期扶持力度,使其在未来的政策优惠、市场准入及资源获取方面面临更大不确定性。因此,当企业在取得更多科技本土研发突破成果、获得更多政府补贴与支持的情况下,企业出于理性决策考虑,会更倾向于提高纳税水平,以建立和维护与政府部门的良好关系,从而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企业的长期价值和竞争力。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在再分配阶段,国际科技本土突破数量的上升会显著增加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激励企业进行税收遵从,促进企业人均税金水平的上升。

最后,第三次分配主要指的是通过慈善捐赠、公益活动等非强制、非市场的方式,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缓解社会贫富差距。在这个阶段,企业主要通过社会责任活动、慈善捐赠等方式参与到第三次分配中,将企业盈利的部分转化为社会福利,为贫困和弱势群体提供援助,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条件,提升生活质量,加强了企业与社区、消费者、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贫富差距,对社会公平公正带来了积极正面的影响。企业声誉理论认为,企业声誉是多方面长期积累的结果,来源于企业的产品质量、客户服务、社会责任感、治理结构等。声誉一旦形成,需要企业持续地维护,以确保其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稳定(Fombrun et al., 2000)^[19]。在现代商业社会中,良好的声誉被普遍视为企业一项重要的无形资产。它包含了消费者、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积极评价与认知,可以显著地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效益。从短期来看,正面的声誉有助于企业在竞争激烈的人才市场中吸引和留住顶尖的专业人才。从长期来看,长期累积的正面声誉能够为企业提供一定程度的“声誉储备”(Suh and Amine, 2007)^[20],当企业面临潜在的危机时,这种储备能够充当一种缓冲机制,有助于增强外部利益相关者如消费者、股东和合作伙伴对企业的信任和支持。这种信任基础使得企业在危机中更有可能获得公众的宽容和理解,从而降低危机对企业长期声誉和经营绩效的潜在负面影响。因此,积极正面的企业声誉不仅可以为企业带来短期利益,而且在长期内也有利于稳

固和增强企业的市场地位 (Fombrun and Shanley, 1990)^[21]。

科技本土研发突破往往代表了某个行业或领域的前沿进展,本身就具有很高的新闻价值,会引起媒体的广泛报道。同时,投资者也会很关心这些突破能为企业带来的潜在利润和市场机会,也可能会在网络上展开更多探讨。现有研究表明,更多的社会关注与媒体报道会给企业带来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压力 (Chen et al., 2018^[22]; Ren et al., 2022^[23]; Cheng et al., 2022^[24])。在这种情况下,增加慈善捐赠有助于企业对良好声誉的维系与巩固。Brammer 和 Millington (2005)^[25] 对企业慈善捐赠支出和相关政策的研究表明,企业进行捐赠活动的目的是为获得良好的声誉,慈善捐赠额越高的企业其企业声誉越好。Waddock 和 Graves (1997)^[26] 指出,企业可以通过进行慈善捐赠向市场传递自身有着优良管理与光明发展未来的积极信号,进一步对公司的收益造成正向影响 (Sánchez, 2000)^[27]。因此,企业在实现科技本土研发突破、提高企业盈利能力的同时,可以通过提高慈善捐赠水平,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企业的良好声誉,更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3: 在第三次分配阶段,国际科技本土突破数量的上升会显著增加企业的慈善捐赠,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企业的良好声誉。

二、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7—2021 年的 A 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剔除了金融类行业公司、财务状况异常的 ST 公司后,最终的研究对象为 3 635 家上市公司以及全国 287 个城市,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城市的经济发展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通过全球知识产权数据库 (Orbis Intellectual Property) 收集了所有中国专利的申请日期、授权日期、IPC 类别、申请人等信息。本文通过筛选和确认每一个 IPC 对应的专利在中国第一次申请并获得授权的最终持有人,作为该 IPC 代表的科技在中国第一次实现突破的时间节点,计算了最终持有人所在企业在我国实现的首个 IPC 的突破数量,从而反映出不同企业在我国实现科技本土研发突破数量的水平。上市公司财务年报中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明细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企业的报纸媒体报道数据和东方财富网的股吧论坛讨论数据来自于 CNRDS 数据库。企业进出口数据来自于中国海关数据。

(二) 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为了检验国际科技本土突破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社会主义收入三次分配理论,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Y_{it} = \alpha + \beta IPCNum_{i,t-1} + \gamma Control_{i,t-1} + \gamma_t + \mu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Y_{it} 为企业 i 在第 t 年对收入进行三次分配的情况,分别用企业薪酬总额除以员工总数的对数 ($AvgPay$)、企业实际支付的总税金除以员工总数的对数 ($AvgTax$) 以及企业捐赠总额除以员工总数的对数 ($AvgDon$) 代表。解释变量 $IPCNum_{i,t-1}$ 表示企业 i 在第 $t-1$ 年获得授权的中国首个 IPC 专利总数的对数,代表企业 i 在国内实现的国际科技本土突破的数量。本文还选取了多个控制变量:

(1) *Size* 为企业规模, 用企业总资产的对数表示; (2) *Leverage* 表示企业负债程度, 以杠杆率衡量; (3) *Growth* 为企业增长速度, 以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衡量; (4) *HHI* 为同行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赫芬达尔指数, 反映企业所处行业的竞争强度; (5) *FCF* 为企业现金流量, 以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除以总资产表示; (6) *TOP10* 为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 反映企业的股权集中程度; (7) *Audit* 为企业采用的会计事务所水平, 该变量为 1 说明企业采用了四大会计事务所审计, 以反映公司的外部监管水平; (8) *Board* 为董事会规模, 以企业的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衡量; (9) *Duality* 为董事长总经理是否两职兼任, 该变量为 1 说明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兼任; (10) *Indepratio* 为企业董事构成, 用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衡量; (11) *Age* 为企业年龄, 用公司上市年限的自然对数表示; (12) *SOE* 为企业股权性质, 该变量为 1 表明是国有企业, 为 0 则为民营企业。 γ_t 为年份固定效应, μ_i 为企业个体固定效应, ε_{it} 表示随机干扰项。

三、实证分析与结果解释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1 为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样本中人均工资、人均税金和人均捐款金额取对数后的均值分别为 11.557、8.986 和 3.612, 说明企业在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中支付的金额逐步递减, 初次分配在企业收入的三次分配中占比最大。核心解释变量 *IPCNum* 的均值为 0.324, 中值为 0, 说明样本区间内上市公司取得国际科技本土突破的情况较少。营业收入增长率 *Growth* 的均值为 0.177, 说明大部分公司的经营情况良好。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值	最大值
<i>AvgPay</i>	31 474	11.557	0.573	10.115	11.549	13.138
<i>AvgTax</i>	31 474	8.985	1.346	5.445	8.852	13.412
<i>AvgDon</i>	31 474	3.612	2.732	0.000	4.118	8.995
<i>IPCNum</i>	31 474	0.324	0.726	0.000	0.000	5.945
<i>Size</i>	31 474	22.126	1.282	19.755	21.950	26.086
<i>Leverage</i>	31 474	0.439	0.206	0.056	0.435	0.896
<i>Growth</i>	31 474	0.177	0.441	-0.595	0.107	2.849
<i>HHI</i>	31 474	0.140	0.149	0.020	0.088	0.886
<i>FCF</i>	31 474	0.046	0.072	-0.173	0.046	0.248
<i>TOP10</i>	31 474	57.706	15.275	22.340	58.560	90.180
<i>Audit</i>	31 474	0.059	0.236	0.000	0.000	1.000
<i>Board</i>	31 474	2.141	0.201	1.609	2.197	2.708
<i>Duality</i>	31 474	0.257	0.437	0.000	0.000	1.000
<i>Indepratio</i>	31 474	0.373	0.053	0.308	0.333	0.571
<i>Age</i>	31 474	2.150	0.777	0.000	2.303	3.296
<i>SOE</i>	31 474	0.398	0.490	0.000	0.000	1.000

(二)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运用模型 (1) 考察了国际科技本土突破对企业收入三次分配的影响。表 2 列 (1)、(2) 的结果显示, 在控制了企业规模、盈利能力、杠杆率、行业竞争强度、企业现金流、股权集中程度、外部监管水平、董事会规模、董事长权力、企业年龄、年份效应和企业个体效应之后, 国际科技本土突破数对企业人均薪酬和人均税金的影响系数为 0.0359 和 0.1101, 且分别在 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可能是因为, 企业在实现了更多科技本土研发突破的情况下, 可以创造出更多新产品, 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营业收入与盈利水平。为了继续维持科技本土研发突破带来的创新与竞争优势, 同时进一步加强并巩固与政府部门的良好关系, 企业会显著增加员工薪酬, 提高纳税水平, 初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说和 1 和假说 2。列 (3) 结果显示, 国际科技本土突破数对人均慈善捐赠的影响系数并不显著, 拒绝了本文的假说 3, 说明科技创新并不会直接推动企业进行更多的慈善捐赠。这可能是因为, 科技创新本身具有声誉效应, 企业取得的科技本土研发突破越多越有利于企业在市场

表 2 国际科技本土突破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变量	<i>AvgPay</i>	<i>AvgTax</i>	<i>AvgDon</i>
	(1)	(2)	(3)
<i>IPCNum</i>	0.0359 ** (2.30)	0.1101 *** (2.74)	-0.1050 (-1.32)
<i>Size</i>	0.0798 *** (7.94)	0.0506 ** (1.96)	0.5028 *** (10.79)
<i>Leverage</i>	-0.0293 (-0.85)	0.0766 (0.83)	-0.7815 *** (-4.59)
<i>Growth</i>	0.0227 *** (4.20)	0.1212 *** (9.16)	0.1004 *** (3.17)
<i>HHI</i>	0.0020 (0.04)	0.8734 *** (5.96)	0.0630 (0.29)
<i>FCF</i>	0.1097 *** (2.67)	0.7683 *** (7.29)	1.0455 *** (4.51)
<i>TOP10</i>	-0.0001 (-0.15)	0.0019 (1.42)	0.0044 * (1.73)
<i>Audit</i>	0.0223 (0.77)	-0.1539 ** (-2.10)	-0.3312 * (-1.91)
<i>Board</i>	0.0163 (0.54)	-0.1575 * (-1.92)	0.2338 (1.37)
<i>Duality</i>	-0.0055 (-0.57)	-0.0261 (-1.10)	-0.0455 (-0.85)
<i>Indepratio</i>	-0.0469 (-0.52)	0.2949 (1.19)	0.2984 (0.63)
<i>Age</i>	0.0355 ** (2.56)	0.1790 *** (4.66)	0.0188 (0.24)
<i>SOE</i>	-0.0085 (-0.32)	-0.2177 *** (-3.25)	-0.3608 *** (-2.88)
<i>Constant</i>	9.6977 *** (43.59)	7.4550 *** (12.75)	-7.9439 *** (-7.41)
企业效应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样本量	31 474	31 474	31 474
Adj R ²	0.758	0.732	0.501

注: *、** 和 *** 分别表示 10%、5% 和 1% 统计意义上的显著; 括号内为 t 值; 下表同。

上建立起强大的品牌形象和市场地位,不仅有助于企业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和客户,还可以帮助企业吸引投资者和合作伙伴,助力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因此,拥有较多科技本土研发突破成果的企业,可能并没有通过增加慈善捐赠提升企业声誉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四、机制检验

(一) 竞争优势效应

当前,在政府与社会媒体广泛关注科技创新事业的背景下,新 IPC 专利在我国成功实现突破之后,激烈的科技竞争与市场竞争会引发同行企业和其他科研机构的竞相研发与积极追赶。但是各 IPC 专利的研发难度与技术复杂程度各不相同,本文认为一个 IPC 专利在首次研发成功的企业之外,被其他后发企业第二次研发成功并申请获得专利的时间间隔,可以成为该 IPC 专利研发难度的反映标准之一。即一个 IPC 专利从首次突破至其他企业第二次申请并授权之间的时间间隔越长,说明该 IPC 专利的研发难度越大,成功实现该 IPC 专利首次突破的企业,可以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保持市场竞争优势。因此,本文在前文识别各 IPC 专利在中国首次突破时间 $IPCTime_{it1}$ 的基础之上,逐一确认了各 IPC 专利在中国第二次申请并获得授权的具体时间 $IPCTime_{it2}$ 。如果第二次申请的公司与首次突破的公司相同或存在持/控股关系,则向后依次替换,直至找到与首次突破企业无股权关系的最近后发企业为止。然后,本文计算得出了各 IPC 专利的后发追赶时间间隔 $IPCTime_{it2} - IPCTime_{it1}$,作为不同 IPC 专利研发难度的度量标准。本文在此基础上求出各年度各行业拥有国际科技本土突破总数和各行业科技后发追赶时长的平均数,并基于中位数进行分组,从而检验基准回归的效果是否在科技本土研发突破数量更多以及科技后发追赶间隔更长的行业更加显著。

表 3 列 (1)、列 (2) 显示,国际科技本土突破数对营业利润增长率 ($Earn-Growth$) 和净利润增长率 ($ProfitGrowth$) 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在取得更多国际科技本土突破之后确实可以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和市场影响力,显著促进企业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提升。此外,国际科技本土突破数对净利润增长率的影响系数更大、更显著,说明国际科技本土突破不仅可以提高企业营业收入,而且可以通过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或创造新的盈利模式来增加公司的净利润,显著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列 (3)、列 (4) 显示,国际科技本土突破数促进员工薪酬上涨的效果在科技本土研发突破数量更多的行业更加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国际科技本土突破数量更多的行业技术丰富度更高,企业更有动机去支付更高的薪酬,去雇佣高级别的研发人员和其他关键岗位的员工来推动其技术创新,从而建立市场竞争优势。列 (5)、列 (6) 显示,国际科技本土突破数促进员工薪酬上涨的效果在后发企业追赶间隔时间更长的行业更加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这些行业技术更为复杂,学习曲线与研发时间更长,后发企业追赶的难度更大。取得国际科技本土突破的先行企业有更大的动机提供更高的薪酬来激励和保留企业关键人才。因此,本文的假说 1 得到验证,在初次分配阶段,国际科技本土突破会显著提高企业的市场利润,企业会为了

维持创新能力和市场优势显著提高员工的薪酬水平。

表 3 国际科技本土突破的竞争优势效应

变量	<i>EarnGrowth</i>	<i>ProfitGrowth</i>	<i>AvgPay</i>	<i>AvgPay</i>	<i>AvgPay</i>	<i>AvgPay</i>
	(1)	(2)	(3)	(4)	(5)	(6)
			科技突破数 多行业	科技突破数 少行业	后发追赶间隔 长行业	后发追赶间隔 短行业
<i>IPNum</i>	0.1822 * (1.82)	0.4574 ** (2.51)	0.0283 * (1.82)	-0.0042 (-0.09)	0.0282 * (1.82)	-0.0073 (-0.1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企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31 474	31 474	19 418	12 056	19 817	11 657
Adj R ²	0.285	0.156	0.763	0.728	0.769	0.727
组间系数 差异检验			Chow Test = 10.51 P-Value<0.001		Chow Test = 8.79 P-Value<0.001	

(二) 税收遵从效应

为了检验企业科技本土研发突破数量增多是否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政府补贴，本文参考王刚刚等（2017）^[28]、郭玥（2018）^[29]关于政府补贴数据的“关键词检索”方法，通过在上市公司财务年报中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明细中搜索“科学技术奖”“技术进步奖”“科学技术奖”“技术奖励”“技术奖金”“科学技术经费”“科学技术款”“高新技术补贴”“关键技术”“重大技术”“863 计划”“973 计划”“星火计划”等反映政府创新政策与科研经费的关键词，整理获得了各公司在各年度获得的科研创新补贴与全部政府补贴总额，并将这两个数据除以总资产，得到了各公司各年度获得的科研创新补贴占总资产之比（*RDSubsidyRate*），以及全部政府补贴占总资产之比（*SubsidyRate*）。

同时，为了验证企业增强税收遵从、降低避税行为是否会进一步获得更多政府补贴和政策支持。本文参考 Desai 和 Dharmapala（2006）^[30]的研究，计算了各公司的会计税收差异（*DDBTD*）指数，其值越大说明企业的避税程度越高。本文在此基础上，求出了各公司各年度的 *DDBTD* 值，并基于行业中位数，设置了虚拟变量 *LowDDBTD*，若该公司当年的 *DDBTD* 指数低于行业中位数，说明该公司的避税程度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取值为 1，否则为 0。

表 4 列（1）、列（2）显示，国际科技本土突破数对企业获得的科研创新补贴和补贴总额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在取得了更多国际科技本土突破成果之后，确实可以在下一年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为企业的科技创新事业提供了资金支持。列（3）、列（4）显示，国际科技本土突破数与行业低避税水平虚拟变量的交乘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避税水平较低的企业可以通过科技本土研发突破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这反映了我国政府更愿意资助在科技创新上有所突破且在税务表

现上合规的企业。这种做法可以看作是政府对这些企业的双重奖励，既奖励其技术突破创新，又奖励其税收遵从行为。在政府补贴政策的引导与激励下，取得国际科技本土突破并且税务合规的企业更有利于实现政府的长期战略目标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此，本文的假说 2 得到验证。

表 4 国际科技本土突破的税收遵从效应

变量	<i>RDSubsidy</i>	<i>Subsidy</i>	<i>RDSubsidy</i>	<i>Subsidy</i>
	(1)	(2)	(3)	(4)
<i>IPNum</i>	0.0174 *** (3.13)	0.0675 ** (2.18)	0.0155 ** (2.41)	0.0537 (1.48)
<i>LowDDBTD</i>			-0.0005 (-0.28)	-0.0252 (-1.47)
<i>IPNum</i> × <i>LowDDBTD</i>			0.0140 *** (2.60)	0.0289 ** (2.2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企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31 474	31 474	25 063	25 063
Adj R ²	0.035	0.305	0.036	0.352

(三) 声誉储备效应

媒体系统依赖理论认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往往依赖于新闻媒体去了解公司声誉的某些属性，这是因为新闻媒体在传播和塑造公众对公司的看法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Ball-Rokeach and DeFleur, 1976）^[31]。媒体不仅是展现企业实际行为的窗口和广告平台，而且还能通过特定报道积极塑造企业形象（Fombrun and Shanley, 1990）。因此，本文参考杨国超和张李娜（2021）^[32] 的研究，通过 CNRDS 数据库收集了上市公司媒体报道数据^①，整理计算了各公司各年度的报纸媒体总原创报道数的对数（*SumReportNum*），作为官方媒体中企业声誉的代理变量。同时本文也参考孙鲲鹏等（2020）^[33] 的研究，通过 CNRDS 数据库收集了东方财富网的股吧论坛讨论数据^②，计算得到了各公司各年度股吧帖子总数的对数（*SumPostNum*）和股吧正面帖子数的对数（*GoodPostNum*），作为广大股民对企业声誉评价与判断的代理变量。

表 5 列（1）、列（2）显示，企业科技本土研发突破对报纸媒体新闻报道总数和股吧帖子总数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0883 和 0.0727，且分别在 1% 和 5% 的统计水

①CNRDS 报刊财经新闻包括了来自 600 多家重要报纸媒体的新闻数据，其中包含了八大主流财经报纸：《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第一财经日报》《21 世纪经济报道》《中国经营报》《经济观察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中央报纸，地方性晨报、日报、晚报以及其他财经报刊。该模块的原始新闻数量为从 1994 年开始至今约 7 000 多万条新闻报道，上市公司新闻累计达 260 多万条。

②CNRDS 股吧评论数据库是基于东方财富网股吧论坛中不同类型的帖子评论进行统计研究而建立的专业性财经文本数据库，包括 2008 年以来至今共计 4.27 亿个帖子。CNRDS 数据库使用计算机领域成熟的文本情感判断方法，文章语气识别率较高，样本内的准确率高达 85%，可以较好地捕捉上市公司的声誉信息。

平上显著，说明随着企业科技本土研发突破数的上升，企业媒体报道总数和股吧讨论数均会显著上升，的确引起了更多媒体和投资人的关注。列（3）、列（4）显示，企业科技本土研发突破对报纸媒体正面新闻报道总数和股吧正面帖子总数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1002 和 0.0765，均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分别大于列（1）、列（2）中全部报道和全部帖子数的系数，进一步证明了科技本土研发突破与企业的正面公众形象之间具有紧密联系。对于企业来说，科技本土研发突破不仅是其研发能力的体现，还是其对社会贡献的证明，不论是官方媒体还是广大投资人均对相关企业给出了高度评价，企业的声誉和品牌形象也可以得到显著提升。

表 5 国际科技本土突破的声誉储备效应

变量	<i>SumReportNum</i>	<i>SumPostNum</i>	<i>GoodReportNum</i>	<i>GoodPostNum</i>
	(1)	(2)	(3)	(4)
<i>IPCNum</i>	0.0883 *** (2.90)	0.0727 ** (2.55)	0.1002 *** (3.19)	0.0765 *** (2.8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企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31 474	30 369	31 474	30 369
Adj R ²	0.785	0.635	0.749	0.636

为了检验科技本土研发突破和慈善捐赠是否对于提高企业声誉具有协同效应，本文也计算了各公司各年度慈善捐赠金额的对数（*Donation*）。表 6 列（1）、列（2）显示，企业科技本土研发突破数与慈善捐赠金额的对数交乘项对企业媒体报道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对股吧帖子数量的影响系数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对于新闻媒体来说，企业的科技本土研发突破与慈善捐赠的结合可能被视为有新闻价值的“双重正面”事件，因此更容易获得报道，而投资者可能更加关注与企业经济表现和股价直接相关的因素。尽管慈善捐赠可能被视为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但其不会直接影响企业的财务表现或市场竞争力，因此并没有引起股吧用户更多的讨论。列（3）、列（4）回归结果显示，企业科技本土研发突破数与慈善捐赠金额的对数交乘项对企业正面媒体报道和正面股吧帖子数的影响系数均不显著。期望确认理论认为消费者在消费和再消费的过程中，其实正在进行着期望确认的过程，消费者对产品进行再消费的选择，是建立在消费者对产品高度认同的基础上（Oliver, 1980）^[34]。因此，对于已经在科技领域取得了显著突破的企业，消费者和社会大众可能已经对其有了很高的期望。因此，即使这些企业进行了慈善捐赠，公众可能仍然认为这是企业应该做的事情，而不会再给予更多的正面评价。表 6 的结果也反映出科技本土研发突破企业进行慈善捐赠对其声誉的影响可能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情况，并没有再带来额外的正面报道或者股吧评价。因此，在声誉储备效应不显著以及缺乏其他税费减免和慈善激励政策的支持与引导下，当前科技本土研发突破企业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和动力去增加慈善捐助，否定了本文的假说 3。

表 6 国际科技本土突破和慈善捐赠的协同效应

变量	<i>SumReportNum</i>	<i>SumPostNum</i>	<i>GoodReportNum</i>	<i>GoodPostNum</i>
	(1)	(2)	(3)	(4)
<i>IPCNum</i>	0.0610* (1.87)	0.0596* (1.84)	0.0837** (2.49)	0.0644** (2.07)
<i>Donation</i>	0.0010 (0.95)	-0.0013 (-1.31)	0.0022** (2.09)	-0.0012 (-1.34)
<i>IPCNum</i> × <i>Donation</i>	0.0027** (2.08)	0.0013 (0.86)	0.0016 (1.26)	0.0012 (0.8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企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31 473	30 368	31 473	30 368
Adj R ²	0.785	0.635	0.749	0.636

五、进一步分析：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

共同富裕包括两个维度：一是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全体人民实现总体富裕，即“做大蛋糕”；二是发展成果为人民所共享，即“分好蛋糕”（方明月等，2022）。前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科技本土研发突破可以通过增加市场收益、优化企业融资、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等方式促进企业显著提升人均薪酬与人均税金，即成功实现了“做大蛋糕”的目标，但是科技本土研发突破能否降低企业内部收入差距，更好地惠及全体员工，进一步“分好蛋糕”，也是有待验证的重要命题。本文参考陈斌开和林毅夫（2013）^[35] 衡量居民城乡收入差距的方法，按照（高管人员薪酬总额/高管人数）/ [（企业薪酬总额-高管人员薪酬总额）/（企业员工总数-高管人数）] 计算了高管平均薪酬与普通员工平均薪酬之比（*MESRatio*），同时也按照这种方法计算了高管薪酬的增长率（*MSGrowth*）和普通员工的薪酬增长率（*ESGrowth*），并将以上指标替换为基准回归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进行实证检验。

表 7 列（1）显示，科技本土研发突破数的上升对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企业科技本土研发突破数的增多并不能缩小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列（2）、列（3）显示，国际科技本土突破数对高管薪酬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 0.0377，且通过了 10%统计水平的检验，国际科技本土突破数对员工薪酬增长率的影响系数为 0.0063，但是不显著。这说明随着国际科技本土突破数的增多，高管薪酬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普通员工，科技本土研发突破的经济回报往往更多地集中在企业高管和关键技术人员手中，科技本土研发突破并不能完全解决“分好蛋糕”的问题。

为了对科技本土研发突破对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本文从股权结构、行业研发投入以及教育水平进行了进一步检验。其中，股权结构为企业是否为国有企业的虚拟变量（*SOE*），行业研发投入为企业所在行业的科研人员占比是否高于平均数的虚拟变量（*HighRD*），行业教育水平为企业所在行业的研究生学历占比是否高于平均数的虚拟变量（*HighEdu*）。表 7 列（4）显示，

国有企业的虚拟变量与科技本土研发突破数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国有企业的科技本土研发突破数对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更低。这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存在相对严格的薪酬管理和限薪制度（赵文卓等，2025）^[36]。2014 年 8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并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对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天价薪酬”进行了明令禁止，旨在调整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结构，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和监控，保障国有企业的战略定位、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相协调。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有企业在科技本土研发突破过程中由于收益分配不均而引发的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避免了科技本土研发突破带来的收益过度集中在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手中，对国有企业内部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

表 7 列（5）、列（6）显示，高研发人员占比行业和高教育水平行业的虚拟变量与科技本土研发突破数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高研发投入水平和高教育水平企业的科技本土研发突破数对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更低。这可能是因为，在高研发人员占比行业和高教育水平行业中，科技本土研发突破并不是由少数人单独完成的，而是需要大量研发人员和高教育水平的员工共同合作。这些行业的特性使得科技本土研发突破带来的收益更倾向于在企业内部进行更均匀的分配。在研发人员占比高的企业中，员工通常具有较高的专业技能，他们在科技本土研发突破中的贡献被高度重视，从而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同时，为了留住和吸引这些高素质的员工，企业也会尽可能保证其薪酬的合理性和公平性。同样，教育水平高的行业通常需要其员工具有较高的创新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这些员工在科技本土研发突破中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在这样的行业中，企业通常会对其员工的贡献给予足够的认可，并给予相应的回报。因此，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劳动者教育水平，培育更多研发人才和高科技企业，有助于从根本上优化我国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和价值创造力，为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带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表 7 国际科技本土突破对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

变量	MESRatio	MSGrowth	ESGrowth	MESRatio	MESRatio	MESRatio
	(1)	(2)	(3)	(4)	(5)	(6)
IPNum	0.1089 (0.61)	0.0377* (1.80)	0.0063 (0.16)	0.3559 (1.60)	0.1720 (0.94)	0.1900 (1.01)
IPNum×SOE				-0.5442* (-1.75)		
HighRD					0.3967* (1.74)	
IPNum×HighRD					-0.3629** (-2.45)	
HighEdu						-0.2565 (-1.21)
IPNum×HighEdu						-0.3491** (-2.1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企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31 474	31 361	31 335	31 474	29 277	28 442
Adj R ²	0.650	0.028	0.042	0.651	0.665	0.667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收集中国约 4 202.99 万件专利信息的基础之上,创新性地将专利 IPC 作为不同科技的划分依据,将各 IPC 在中国首次申请并获得授权的日期视为我国实现了相关国际科技本土突破的时间节点,整理并计算了各上市公司各年度的国际科技本土突破数量,并结合社会主义收入三次分配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实证检验了国际科技本土突破对企业收入分配及履行共同富裕责任的影响。研究表明:首先,国际科技本土突破可以促进企业人均薪酬与人均税金显著增加,可以通过“做大蛋糕”支持企业履行共同富裕责任,但是在第三次分配中,对人均捐赠的影响依然有待提高;其次,竞争优势效应和税收遵从效应分别是国际科技本土突破促进企业人均薪酬与人均税金显著提升的重要渠道;最后,国际科技本土突破并不能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随着企业科技本土研发突破数量的增加,高管的薪酬增长速度更快,科技本土研发突破对“分好蛋糕”的影响效果有限。本文的研究成果具有以下启示。

第一,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从本文收集的数据来看,我国专利 IPC 种类数只达到了全世界 IPC 种类总数的 58.2%,仍然有超过 40% 的专利类别处于空白状态,说明我国在科技自主创新方面仍然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政府和相关部门应根据 IPC 分类的空白情况,针对当前我国科技存在空白与差距的领域,调整研发政策并增加人力、物力以及资金投入,鼓励我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在空白领域加强国际合作,加大对先进技术和知识的引进和突破,加速填补我国专利 IPC 空白,促进我国科技种类的丰富与完善,进一步缩小我国与全球技术前沿的差距。

第二,坚持深化中国特色收入分配改革,全面执行公正与效率并重的分配原则,确保高质量的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本文基于社会主义收入三次分配理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当前企业科技本土研发突破对提升人均税金的影响最大,人均薪酬次之,人均捐赠最弱。这说明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调整收入分配机制体制,关注如何更好地引导和激励科技创新成果的实际应用与商业化,确保这些成果能够为国民带来更多的实际收益。特别是在当前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科技的快速发展阶段,政府和企业应加大对员工数字技能培训的投入,不仅可以帮助员工适应数字时代带来的变化与要求,还有助于提高员工的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缩小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

第三,积极推动中国特色供应链创新与区域合作创新战略,全面加强跨地域的供应链整合和创新资源共享机制,共同发挥科技本土研发突破的强大赋能效果。政府应加大对供应链整合与科技创新区域合作的政策支持力度,建立供应链创新与区域合作的信息平台,汇集各方资源,加强供应链上下游之间、地区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和数据共享,同时设立专项资金,鼓励科技本土研发突破企业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以及当地企业加强技术合作与联合研发,提升科技成果的研发效率与推广速度,确保科技本土研发突破的技术红利通过供应链与区域协作更广泛、更高效地惠及全社会。

[参考文献]

- [1] 孙豪, 曹肖烨. 收入分配制度协调与促进共同富裕路径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2 (4): 3-24.
- [2] 李实, 朱梦冰. 中国经济转型 40 年中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 [J]. 管理世界, 2018 (12): 19-28.
- [3] HE J, TIAN X. Institutions and Innovation [J]. Annual Review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20, 12 (1): 377-398.
- [4] 肖土盛, 孙瑞琦, 袁淳, 等. 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结构调整与劳动收入份额 [J]. 管理世界, 2022 (12): 220-237.
- [5] 方明月, 林佳妮, 聂辉华. 数字化转型是否促进了企业内共同富裕? ——来自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2 (11): 50-70.
- [6] 王永钦, 董雯. 机器人的兴起如何影响中国劳动力市场? ——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J]. 经济研究, 2020 (10): 159-175.
- [7] 何小钢, 朱国悦, 冯大威.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3 (4): 98-116.
- [8] 李海舰, 杜爽. 推进共同富裕若干问题探析 [J]. 改革, 2021 (12): 1-15.
- [9] SCHUMPETER J A. Socialism,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M]. Harper and Brothers, 1942.
- [10] LIEBERMAN M B, MONTGOMERY D B. First-Mover Advantage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88, 9 (S1): 41-58.
- [11] CADSBY C B, SONG F, TAPON F. Sorting and Incentive Effects of Pay for Performance: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50 (2): 387-405.
- [12] DECI E L, KOESTNER R, RYAN R M.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Experiments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Extrinsic Rewards on Intrinsic Motivation.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9, 125 (6): 627.
- [13] 刘行, 吕长江. 企业避税的战略效应——基于避税对企业产品市场绩效的影响研究 [J]. 金融研究, 2018 (7): 158-173.
- [14] ALLINGHAM M G, SANDMO A. Income Tax Evasi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72, 1 (3-4): 323-338.
- [15] 刘行, 叶康涛. 企业的避税活动会影响投资效率吗? [J]. 会计研究, 2013 (6): 47-53, 96.
- [16] 叶康涛, 刘行. 公司避税活动与内部代理成本 [J]. 金融研究, 2014 (9): 158-176.
- [17] HASAN I, HOI C K S, WU Q, et al. 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on the Cost of Bank Loan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4, 113 (1): 109-130.
- [18] KIM J B, LI Y, ZHANG L.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 Firm-Level Analysi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1, 100 (3): 639-662.
- [19] FOMBRUN C J, GARDBERG N A, SEVER J M. The Reputation QuotientSM: A Multi-Stakeholder Measure of Corporate Reputation [J]. Journal of Brand Management, 2000, 7 (4): 241-255.
- [20] SUH T, AMINE L S. Defining and Managing Reputational Capital in Global Markets [J]. Journal of Marke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2007, 15 (3): 205-217.
- [21] FOMBRUN C, SHANLEY M. What's in a Name? Reputation Building and Corporate Strategy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0, 33 (2): 233-258.
- [22] CHEN X, YI N, ZHANG L, et al. Does Institutional Pressure Foster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Top 100 Companies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8 (188): 304-311.
- [23] REN S, HUANG M, LIU D, et al.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Mandatory CSR Disclosure on Green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Firms [J].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23, 34 (2): 576-594.
- [24] CHENG L, XIE E, FANG J, et al. Performance Feedback and Firms' Relative Strategic Emphasi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Board Independence and Media Coverage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2 (139): 218-231.
- [25] BRAMMER S, MILLINGTON A. Corporate Reputation and Philanthropy: An Empirical Analysis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5, 61 (1): 29-44.

- [26] WADDOCK S A, GRAVES S B. The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Financial Performance Link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18 (4): 303–319.
- [27] SÁNCHEZ C M. Motives for Corporate Philanthropy in El Salvador: Altruism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0, 27 (4): 363–375.
- [28] 王刚刚, 谢富纪, 贾友. R&D 补贴政策激励机制的重新审视——基于外部融资激励机制的考察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7 (2): 60–78.
- [29] 郭玥. 政府创新补助的信号传递机制与企业创新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 (9): 98–116.
- [30] DESAI M A, DHARMAPALA 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High-Powered Incentive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6, 79 (1): 145–179.
- [31] BALL–ROKEACH S J, DEFLEUR M L. A Dependency Model of Mass–Media Effects [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76, 3 (1): 3–21.
- [32] 杨国超, 张李娜. 产业政策何以更有效? ——基于海量媒体报道数据与研发操纵现象的证据 [J]. *经济学 (季刊)*, 2021 (6): 2173–2194.
- [33] 孙鲲鹏, 王丹, 肖星. 互联网信息环境整治与社交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 [J]. *管理世界*, 2020 (7): 106–132.
- [34] OLIVER R L. A Cognitive Model of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Satisfaction Decisions [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0, 17 (4): 460–469.
- [35] 陈斌开, 林毅夫. 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 (4): 81–102, 206.
- [36] 赵文卓, 张新民, 杨道广. 社交媒体报道与高管薪酬治理——基于公平性视角的实证检验 [J]. *南开管理评论*, 2025 (4): 98–108, 120.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Local Breakthroughs on Corporate Income Distribution

GONG Bing YANG Siyao XU Zhaoyi YIN Wenjie

Abstract: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dataset of approximately 42.0299 million patents in China, this study quantifies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localization breakthroughs across 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 and investigates their impact on intra-firm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se breakthroughs significantly increase per capita employee compensation and per capita tax payments, but show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ffect on per capita charitable donations. We identify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effect and tax compliance effect as the key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these breakthroughs drive compensation growth and tax compliance,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the reputation reserve effect implies that for firms with extensive prior breakthroughs, charitable donations do not yield additional reputational benefits. Notably, these breakthroughs fail to reduce internal income inequality; instead, executive compensation growth outpaces that of ordinary employees as their numbers rise. All findings withstand endogeneity tests and robustness checks, provid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advancing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Local Breakthroughs; Common Prosperity; Income Disparity; Triple Distribution; Tax Compliance

(责任编辑 王 瀛)